

第一章

重庆受命

兰州受“斥”与重庆赋闲

我自 1933 年秋放弃上海申报国际评论记者职业，投身于国民党外交界后，到 1940 年已升为外交部简任秘书兼交际科长，主管礼宾工作。当我正在幻想出使西方，实现做一个职业外交官的美梦的时候，1943 年 7 月 1 日，蒋介石却手令我任“外交部驻甘肃省特派员”。我自知“强龙难压地头蛇”，加以那里黄沙蔽日少晴天的情景实在难熬，不愿前往，我曾想尽种种办法来绕过这道手令，但均未达到目的。拖到 1944 年 5 月，不得已才赴兰州，接任我所不愿接受的职务。

到任不久，适逢“伊宁事件”^①发生，盛世才倒台，吴忠信继任，新疆情况十分混乱。兰州为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起点，是了解新疆的重要观察站，我作为外交特派员，自有义务将所获情报陆续电告国民党中央。当时我还有个隐衷未敢外露，原来 1932 年我在上海承敬爱的邹韬奋同志介绍而认识的杜重远先生^②竟被盛贼杀害。噩耗传来，我悲愤异常，只得假借情报以促进当局改弦易辙。适印度驻华专员梅农（印度独立后任

第一任印度驻华大使)从新德里出发,跨越中印边界,行程历时165天,以重庆为终点(著有《新德里——重庆旅行日记》,1947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44年12月6日,他到达兰州,因与我很熟,与我谈及“伊宁事件”,他坦率地阐述了他的看法。我遂于10日电告重庆,妄想假借他的言论来讽谏重庆当局。电中说:“梅农亦以此次哈(指哈萨克族)乱远因在过去民族政策之错误,新疆上层组织虽已改变,而各地基层依旧,务须逐渐更换,彻底实施孙中山的民族政策,使新省成为三民主义示范区,则西北可无后顾之忧。”并电称:“该员素称反英,语出肺腑。回顾清朝迭次回(指回族)乱,皆源于虐政。殷鉴不远,谨电参考。”不想这“错误”、“虐政”等词是蒋介石所最忌讳、最不爱听的。12月15日,我再电重庆:“被围于伊宁教导队之我方官员、居民约二千人,因粮食无着,早以草根充饥。我机每隔两日飞往投掷粮食弹药,略事接济”。同时指出:“投机商人颇为活跃,赴新者相继走私,而部队带货者更复不鲜。”揭了蒋介石的王牌军胡宗南和地方大员的伤疤,更为蒋介石所不悦。适甘肃省主席谷正伦,与我在日常工作中发生摩擦,又被他重重地“奏”了一本,我活该倒霉了。

果然不久,1945年1月27日国民党外交部发来快邮代电,转达所谓“委座”批示:“此种报告根据何来?而且新疆事有迪化(今乌鲁木齐)特派员在,于凌何关,应‘斥责’。”

老友孟鞠如,当时在部内任人事处副处长,熟知此事内幕,特来函安慰说:“兄事已有决定,甘省大吏必有与兄意见不甚相合者,委座硃批见责似非无因。”“幸吾兄大气磅礴,胸襟开阔,”劝我“不必因此而影响天生勇往进取之精神”。不久,国民党外交部即来电将我撤职。我在兰州任职仅有十月,1945年3月27日即偕同妻子儿女飞返重庆。

我向来为官以廉洁自恃，活动费用，实报实销，从不贪污公款。这次回到重庆，可算是一贫如洗，加上物价飞涨，生活更加狼狈。万不得已乃向国民党外交部每月借支简任二级薪俸，法币 640 元，以资糊口，连借了三个月。

这时在重庆的友人纷纷到我寓慰问，其中有少年同窗，青年同事的老友朱学范。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我慰问，并煞费苦心心地为我另筹谋生糊口之道，这是我终身难忘的。

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门户森严，不拉关系，不走后门，不靠裙带，不送厚礼，难找工作。此种不正的腐朽作风，虽为我所痛恨。但因我受蒋介石亲批“斥责”，复职无望，欲作职业外交家的理想就将成泡影。万般无奈，乃于 1945 年 6 月，托我四姐夫潘铭新（当时他任中国建设公司总经理）向宋子文说项。适遇蒋介石对国民党上层人事略有调整，宋子文留任行政院长，辞去外交部长兼职，由原中宣部长王世杰担任外交部长，原政务次长吴国桢^③则调任中宣部长。宋子文借此机会任命我为“外交部专门委员”。在这新旧交替时刻，我就作为宋子文的“起身炮”而恢复了官职。

日本投降与重庆受命

当我个人生活发生急剧转折的时候，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45 年 5 月 8 日，苏联红军在美、英、法等同盟军的配合下，打败了希特勒德国，结束了欧洲的战争。远东局势随之发生极大变化。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日的艰苦奋战，已把日军打得精疲力尽，日本败局已定。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9 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号召。在中苏两国军民的紧密配合下，一举消灭了日本陆军最后一支精

锐部队——关东军，迫使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在苏联决定出兵、日寇即将投降之时，美国匆匆忙忙地于8月6日和9日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并就此大肆宣传说什么日本投降是怕美国的原子弹，从而贬低我国人民浴血抗日和苏联军队英勇参战的作用。这与坐山观虎斗的蒋介石趁抗日胜利，仓皇下山摘“桃子”的表演，真是异曲同工，配合得微妙极了！

正当我刚被任命为国民党外交部专门委员之际，忽然传来日寇投降的消息，一时山城重庆上下沸腾，漫山欢呼，鞭炮之声响彻云霄。我的心情亦感到愉快，精神有所振奋，对蒋介石又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1945年8月17日，盟军统帅部发布第一号命令：“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北纬16度以南由英国军队受降。于是，蒋介石命令国民党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率其全军人越，在河内设立占领军司令部，接受日本投降。同时，国民党行政院还炮制出一个《占领越南军事及行政设施原则十四项》，规定由外交、军政、财政、经济、交通、粮食等六部各派代表一人，组成顾问团，在占领军司令部内，协助卢汉司令工作。国民党外交部指定我为代表，参加顾问团，负责处理有关对外事务。

于是，我往访国民党行政院新任秘书长蒋梦麟、政务处长徐道邻。我同徐道邻比较熟。他是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的儿子，曾留学德国，迭任驻法西斯意大利代办，驻纳粹德国代办等职，受法西斯影响很深；曾写《敌乎，友乎》一文，在当时南京《外交评论》上发表，为当时人们所瞩目，受到老蒋赏识。我问他这次赴越任务如何？他轻描淡写地说：“你此行

很简单,仅仅是日军向我军投降,我军向法军交防,不消两三个月,你就可完成使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当时我对他的说法颇为怀疑。经过后来历史的检验,证明他根本不了解越南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他的看法是非常荒谬、完全错误的。



顾问团成员合影,左起第三人为凌其翰。

这时各部代表相继被指定。凌其翰为外交部代表,邵百昌为军政部代表,朱偁为财政部代表,庄智焕为经济部代表,郑方珩为交通部代表,马燊荣为粮食部代表。

1945年9月15日,国民党行政院召开赴越顾问团会议。当时,邵百昌原为军政部驻昆明办事处主任,已到河内。郑方珩已去昆明,马燊荣没有出席。实际上仅我、朱偁和庄智焕三人出席。会议由徐道邻主持,由行政院参事黎公琰宣读事前油印好的《占领越南军事及行政设施原则十四项》(全文见附件一)。

国民党行政院炮制的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占领军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关系,规定“占领越南时期,依据事实上需要,由盟军最高统帅部规定之”。二是确定顾问团的组

成和职责。明文规定“行政院在占领军总部内设顾问团，由外交、军政、财政、经济、交通、粮食六部及行政院秘书处各派代表一人组成之，由行政院指定其中一人为召集人”。“凡占领军总部处理有关行政部分之一切命令，概由顾问团拟定，由占领军总部颁布施行，顾问团召集人得为占领军总部之发言人”。“顾问团应将处理情形随时报告行政院查核”。实际上是行政院要控制占领军。三是处理各方面关系的办法。规定“为明了实际情况及整齐步骤起见，顾问团得与占领军总部第五处处长、副处长、美军代表及法国代表团之主要负责人员举行会报、密切联系，以期一切措施妥善适当。”四是有关处理人员过境、资产接收、物资供应、货币流通、企业管理以及粮、煤、运输工具之提供等具体措施与清算办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措施都以尚未回到越南的法国殖民者为一方，有关措施和办法均须与法方商洽，而只字不提越南。并规定“对法越间一切关系一概严守中立态度，不加干预”。五是对我在滇越铁路的权益和在越华侨的地位等问题规定“在政府未作最后决定以前，应取保留态度，不必表示意见。”然而，“为确保军事安全及部队过境运输便捷计，滇越铁路及一切港口应在占领军总部监督指挥下，暂行实施军事管理。”这十四项行政设施原则完全是根据蒋介石的主观意图炮制出来的。

在黎参事念完这个“行政设施原则”后，徐道邻接着宣布：“根据十四项原则三、四两项规定，行政院指定外交部代表凌其翰为顾问团的召集人兼占领军总部发言人。”因此，我既成了顾问团的召集人，又是占领军总部的发言人。但后来的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翌日，国民党行政院秘书处致外交部公函一件，转送上述行政设施原则的全文，并说明要我当面与卢汉司令联系，令我

早日启程。记得当时常务次长刘锴接见我时，说什么“这次你到河内去任行政院顾问团外交部代表兼顾问团召集人，这是短期出差，河内距重庆很近，不算出国，预料不久你将完成使命而回。”刘锴的话，轻描淡写，与徐道邻所说，如出一辙。

就这样在抗日胜利，局势好转，同僚们弹冠相庆，纷纷出国各就美差之时，我无可奈何地接受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人所不屑、我所不欲的使命。

越南形势与我的幻想

我自受命以后，一直惴惴不安。查阅当时越南情况的材料，使我对上述行政设施原则更加怀疑，实感难以贯彻。因为1940年秋，日军侵入越南，法国海军中将德古以印度支那总督的名义，向日军屈膝投降，从而法国殖民者早已丧失统治地位。1943年3月9日，驻越日军又突然以武力解除法国殖民军的武装，将法军六千人全部拘禁在河内军营里；驻在中越边境的部分法军逃入我国云南境内，法国殖民者在越已无立锥之地。而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创建越南独立同盟（即越盟），在日本投降前夕，于1945年8月举行总起义（即“八月革命”），夺取了行政权，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了临时政府。“宣布完全同法国脱离关系，废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一切条约，取消法国在越南的一切特权”^④。越南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国民党行政院逆历史潮流而动，炮制出的所谓“行政设施原则”完全脱离实际，必然要受到各方面的抵制。

我估计到这次赴越的任务，决不会像徐道邻、刘锴等所说的那样轻松，在撤军交防问题上必有一番争论，在滇越铁路权

益和越南华侨地位等问题上，也不应采取“保留态度，不必表示意见”的做法。尤其是我作为外交部的代表，正是需要利用时机，与法方折冲交涉，讨价还价，尽可能为国争权，为民争利，方不负这次使命。但兰州受“斥”的教训，注定我的幻想要归于破灭。蒋介石为人，一向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要想在他手下做官，必须顺着他干，否则必然倒霉。兰州罢官的经验教训务必记取。说也奇怪，在兰州由于我摸不清他的意图，仅仅几个情报电，就遭受他“斥责”、撤职，在河内八个月，连发电报近百个，由于处处顺着他干，摸清了他的意图，就始终没有遭受他的斥责。因此，摸清他的意图，亦步亦趋，不越雷池半步，官职才有保证。这是在蒋介石手下做官的秘诀。

面临这样不平常的任务，又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我孑然一身，单枪匹马，前往河内，左右折冲，没有帮手，怎么能行？于是我想起了我青年时期在上海震旦大学预科的同学，后来又在上海邮局同事的洪之珩。他原在国民党驻西贡领事馆工作。日军占领越南期间，被日军拘禁在集中营中达四年之久。日本宣布投降后才获释放，正在河内待命。我征得人事处的同意，暂留他在河内做我的助手。他的工作效率很高，一个人可顶四、五人的工作。实际上他后来成为我在河内时期的唯一得力助手⑤。

临行前，我什么都没准备。国民党外交部指示机要处给我几本密码，到河内如何发报，要我自己设法就地解决。当时我只好央托司令部电台、军统电台台长王之和和中央通讯社电台陈叔同（陈布雷之弟）代我拍发。一切仰人鼻息，早发迟到或漏发丢失，在所难免，不足为奇。

① 伊宁事件指1944年11月在新疆发生的一次民族事件。由于国民党新疆当局处理不当,对哈萨克等少数民族采取大汉族主义和高压政策,到1945年9月事件更趋严重。后经张治中赴迪化(今乌鲁木齐)与伊宁代表商谈。盛世才因此倒台,吴忠信继任新疆省主席。

② 1933年3月间,杜重远在上海基督教慕尔堂与侯御之女士结婚,因环绕邹韬奋的朋友中我年纪最轻,尚未结婚,按西俗陪新侯相必须为未婚青年,于是他邀我为侯相。

③ 吴国桢在调任中宣部长前夕,即1945年8月18日与法国临时代办戴立堂签订了中法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广州湾即今之湛江港,连同海南岛原为法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法国慨然允诺提前五十年交还广州湾,这是戴高乐的“丢卒保车”之计,他的最终目的在保全远东的最大殖民地印度支那,而越南三圻适成为印度支那的核心,这是当时戴高乐的战略思想(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全文见附件)。

④ 见《胡志明选集》第二卷第3页,《独立宣言》(1945年9月2日)。

⑤ 1946年4月5日,我离开河内回国后,洪之珩仍留在河内。他先任驻河内总领事馆随习领事,继调驻塔那那利佛领事馆任副领事。1949年10月10日,国民党驻法大使馆和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人员通电起义后,同年12月,驻塔那那利佛领事馆也通电起义。洪之珩是参加起义的积极分子,1950年8月回国,与我同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第三期学习。毕业后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民革成员。1980年5月8日,我计划写这段时间的回忆录时,驰书动员他也写。不料他正患肺癌。动手术后,于6月30日复函同意我的建议;7月17日又就我提出的问题帮我回忆,给我不少启示。但不久因肺癌扩散,医治无效,不幸于1981年4月11日在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